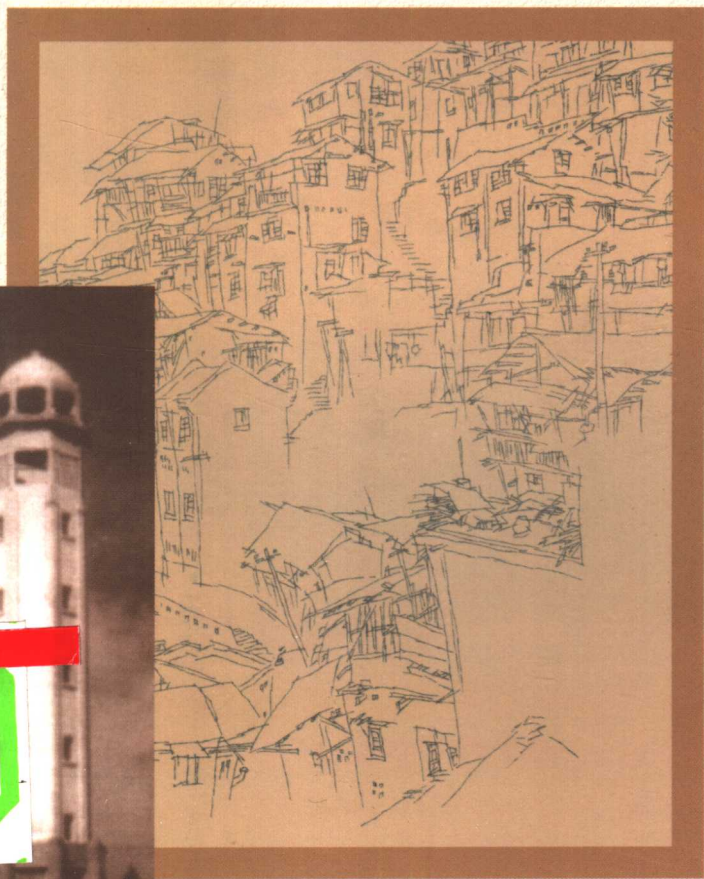


靳明全
主編

重慶

抗战文学论稿

重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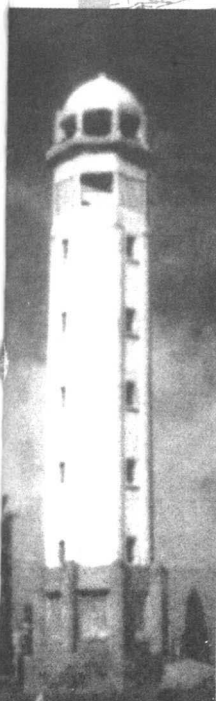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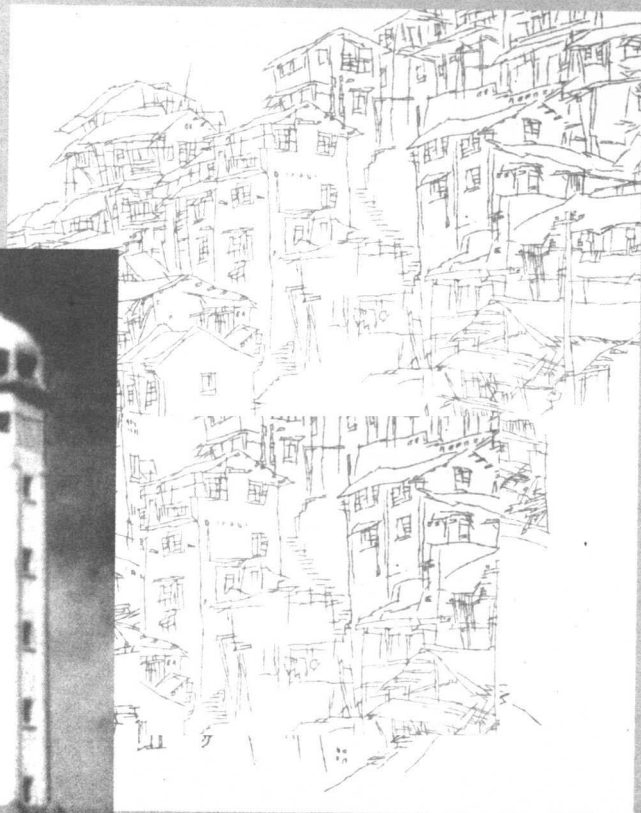
· 重庆市“十五”社科规划研究项目

重庆

靳明全 主编

抗战文学论稿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抗战文学论稿 / 靳明全主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7

ISBN 7-5366-6356-0

I. 重... II. 靳... III. 抗战文艺研究—重庆市
IV. I20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2613 号

▲重庆抗战文学论稿

靳明全 主编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寇小平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2 千 插页 1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5366-6356-0/I·1153

定价: 13.50 元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概论 | (1) |
| 第二章 | 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战时性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论争 | (40) |
| 第三章 | 抗战文学的“服务论” | (55) |
| 第四章 | “文协”在重庆的活动 | (67) |
| 第五章 | “文协”各分会的活动 | (104) |
| 第六章 | “文协”期间老舍的创作活动 | (126) |
| 第七章 | 抗战时期郭沫若史剧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情感表现 | (154) |
| 第八章 | 抗战时期艾青的诗歌创作 | (168) |
| 第九章 | 抗战时期胡风的文学理论 | (203) |
| | 主要参考书目 | (243) |
| | 后记 | (245) |

第一章

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概论

对于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应该如何进行历史与现实相一致的再认识,实际上涉及到对于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地位与文学地位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现实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陪都文化与文学这一区域文化与文学现象的研究,将关系到能否进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区域化发展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性开拓。因此,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有可能成为有关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之中的一个中国范例,在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具有典范性的现象样本的同时,也为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具有学术性的理论基点。

在此,一切将不得不从“陪都”一词的语义辨析来开始。在汉语中对于“陪都”与“行都”的区分与运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并且至少从历史到文学的文本之中得到相关的印证。所谓“陪都”,即“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如周代的洛邑,宋代的建康,李白《永王东巡歌》:‘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陪都’”;而所谓“行都”,则为“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以备必要时政府暂驻。

《宋史·黄裳传》：“出攻入守，当据利便之势，不可不定行都”^①。由此可见，“陪都”与“行都”之间的语义差异，主要在于是否成为“政府暂驻”之地，两者相同之处更在于并非对于首都的取而代之。当然，一个词的语义往往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发生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的基本义将是稳定的。

那么，“陪都”的语义发生了什么样的现代衍变呢？当下有关“陪都”的一个英语译名 Temporal Capital，正好提供了一个就其语义衍变而进行辨析的语义用起点。这是因为，如今每当有关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一些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的时候，由于要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于是乎需要一个英语的篇名与摘要及关键词来“陪伴”着。就目前所见到的对于“陪都”的英语译名来看，就是 Temporal Capital。只不过，这样的英语译名，从直译的语义来看，不过是“临时首都”。但是，从汉语中对于“行都”与“陪都”的语义区分来看，其基本义倒应该是用以“陪伴”作为一国之正式首都的“另设的一个都城”，也就是从属于国都的具有着与国都相类似的行政功能的预备性质的非正式首都，简言之，就是国都之外的“副都”即“陪都”。在这样的基本语义规定下，“陪都”用英语来硬译，似乎倒应该是“Vice Capital”。一般地说，在一个国家之内，只有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被迫迁移，才有可能由于国都的沦陷，促使陪都成为战时首都，即临时国都。由此可见，“陪都”一词的基本义应该是“副都”，而衍义则是“临时首都”。或许因为如此，当年的陪都重庆，其英语译名就是“Provisional Capital”，既是国都之外具有预备性质的副都，又是国都之外的临时首都。

从陪都的基本义来看，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陪都，往往与其是否

^① 《辞海(上)》，第1005页“陪都”，《辞海(中)》第1823页“行都”，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成为将发挥全国性影响的区域文化中心有关,具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强的政治控制效率、较快的社会意识演变,从而成为民族国家之中与国都相似的、具有较大文化凝聚力的中心城市。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国都与陪都的行政性确认,事实上虽然是直接取决于执掌一国政权的执政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对一个城市进行这样的行政性确认。一个政府要进行这样的确认,除了必须认可这一城市在全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区域中心地位之外,还必须选择进行确认的时机,而这一时机往往是与国家的政治需要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面临战争威胁之下,进行从政略到战略的重大调整,从而才有可能确立这一城市在战争之中所可能发挥出来的战时首都的文化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当一个城市成为区域文化中心之后,才有可能被确认为陪都。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无论是作为“副都”的陪都,还是作为“临时首都”的陪都,都是与区域文化中心的这一城市保持着从空间到时间上的阶段性一致。

事实上,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仅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之中,由执政者基于从政略到战略的现实需要,在抗日战争的局部发生之时就提出必须设立陪都,以有利于进行持久战争,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之后,正式确立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来作为战时首都的所在地。显而易见的是,正是战时首都的确立,才将陪都一词所蕴涵着的副都与临时首都的语义进行了统一,从而也就赋予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以战时性这一抗战时期中国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特征。

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不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起点,仅仅是从时间上来看,就应该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局部战争向着全面战争演变的可能性日渐突出而成为现实性的事实。这就表现在数月

之后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的再度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从关外的沈阳燃烧到关内的上海,直接威胁着国都南京。在 1932 年 1 月 29 日出刊的《中央周刊》上,发表了《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宣言》,其中就明确指出,“一·二八”事变已经导致了“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胁”这样的严重后果。第二天,也就是 1932 年 1 月 30 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移驻洛阳办公。2 月 1 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军事防御;2 月 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由此可见,此时的中国执政者不得不面对这一严酷战争现实,而如何确立陪都,也就具有了从政略到战略的紧迫性。

1932 年 3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开幕词中指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决定“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于是,会议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这一提议案,议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3 月 6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议决该提议案的同时,又通过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任命。这样,从抗日的战略角度来看,设置陪都与行都的现实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持久抗战,这些具体体现在 3 月 10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的《巩固国防长期抗日案》之中。^①

如果从抗日的政略上来看,早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认为:“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中国国民党全书(上)》,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1-442 页;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2、156 页。

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因而主张要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一个陆都”^①。由此可见，在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军事力量处于敌强我弱的状态下，进行持久战具有着从政略到战略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因此，无论是孙中山从理论上第一个提出了持久战的远见卓识，并以在中国内地建立“陆都”的方式来予以实施的具体设想；还是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遵行总理遗训，为了抗日而制定持久抗战与设立陪都的国策，都显现出在政略与战略相一致的政治前提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陪都重庆的出现，不仅至少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实机遇，而且更是一种势必如此的历史选择。

这是因为，对于那些研究中国区域及其城市发展的国外学者来说，重庆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就已经被他们视为是长江上游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重庆已经成为地区内外贸易的主要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地区可以看做重庆的最大腹地”，这是因为在此时，“显然，经济中心只要有可能是总是坐落在通航水道上，整个中国都是如此”。这样，在中国城市化的现代转型中，较之传统城市的基本文化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现代城市的基本文化功能则是以经济功能为主，尤其对于区域文化中心城市来说更是如此。这就难怪在长江上游地区，虽然在“十九世纪早期，成都已明确成为中心都市，而重庆只不过是个地区都会”，然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地区大都会的相对经济中心地位，正处于过渡阶段”，以至于最终“这两个城市的作用却明确地颠倒过来了”^②。这就表明，较之成都，此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档案馆编著：《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②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3、344页。

的重庆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使之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中心城市。

随着重庆的经济功能的不断发展,首先直接影响到重庆的政治功能的相应增长。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重庆蜀军政府率先全川之先,于1911年11月22日宣告独立,被各省军政府承认为“四川政治中心”。此后,重庆无论是在“二次革命”中,还是在护国战争与护法运动里,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后又成为地方军事势力眼中的一块肥肉,到1935年2月,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随着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的上升,重庆又具备了现代城市文化功能之一的意识功能,来推动思想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为起点,不仅组织了重庆商学联合会来推进群众爱国运动的持久进行,而且成立了中国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以促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入。^①由此可见,重庆这一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中心城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已经具有了经济、政治、意识这三大基本文化功能,从而为重庆最终成为现代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中心,显然已经具备了被选择成为陪都的基本条件,而能否成为陪都,还得等待选择的时机。

1932年5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西京筹备委员会组织条例》;5日,中日《淞沪停战协议》在上海签字;30日,国民政府各机关从洛阳迁返南京。6月1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返回南京。11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于12月1日从洛阳迁回南京。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并举行还都典礼;25日,国民政府成立建设西北专门委员会;28日,中

^① 参见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著:《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第38、48、57-63、141、68-70页。

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设立西京市，直辖行政院。至此，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陪都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但是，刚刚进入1933年，日军在1月1日挑起榆关事件，在两天后攻陷山海关，战火燃起，而战争威胁再度降临。1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将故宫重要古物珍品南移，以避免战端突起的可能损失。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4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又指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也就是在军事上进行从第一线到第三线“这样的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①。这样，在“安内”与“攘外”之间，孰先孰后，固然首先取决于执政当局的集团利益，但也最终决定于抗日战争的中国现状。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态势不断扩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中，就明确规划“将全国形成若干防卫区及核心，俾达长期抗战之要求”。为了实施这一纲要，1935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开始对重庆进行从行政、财政、军事到金融、交通诸多方面的整顿。3月2日，蒋介石首次飞抵重庆这个当时四川省政府的所在地；4日，蒋介石在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周大会上，发表题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演讲，强调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

^① 《中国国民党全书(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2-444页；《蒋介石秘史(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

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具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古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能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①这实际上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承认了重庆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对于如何设立陪都的战时调整。

1935年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央地方划分权责纲领》;6月18日,四川省政府决定由重庆迁往成都。10月3日,驻川参谋团奉国民政府令,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在1936年初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正式确立以四川为对日作战的总根据地,而重庆行营随即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1937年3月21日,成渝铁路开工建筑;4月16日川军退出重庆,中央军随即进驻重庆。^②这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以重庆为核心城市的战略大后方已经处于逐渐形成之中,重庆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设立陪都所可能选择的主要对象。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促成了陪都重庆的出现,不仅使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而且重庆也成为中华民国永久之陪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从7月8日到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再电告抗战前方将领,强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应“运用全力抗战”,并在31日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重申“全力抗战”的

^① 《防卫计划纲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档案馆藏;《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编:《参谋团大事记》,1937年重庆出版,第383页。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全书(上)》第449页;《重庆大事记》第141-144、151-152页。

国策。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撤消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随即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1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会决议,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三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划全国为四个战区,建立战时体制。9月10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誓以必死决心,求最后胜利;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从而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于是,中国国民党进行相关政略调整,10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以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11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这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①

11月19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报告,指出:“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继续抗战,必须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达重庆,十万民众齐集码头热烈欢迎^②。显然,此次国民政府的到来,与数年前迁往洛阳已经大不一样,不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在战时体制之下,以重庆为战时首都,进行战时文化的重建,从而

① 参见《中国国民党全书(上)》第454-455页。

② 参见《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号,1937年12月1日。

实现政略与战略相一致的持久抗战这一现实需要。这样,国民政府对于重庆作为战时文化发展的全国中心的确认,已经毫无疑问,因而也就导致陪都重庆的最后设立。

当然,对于陪都的设立,不仅必须考虑到在战时体制下重庆的城市功能是否能够得到不断增强,以保障战时首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也必须考虑到在战时体制下重庆的文化资源是否能够相应增长,以保证战时文化重建过程中的诸多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陪都重庆最后设立,必须经过战时体制的全面检验,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战时体制通过对于战时文化各个层面进行指令性控制,形成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特别发展机制:在经济上,转向战时生产,保障经济建设的专门性与针对性,国民政府组建经济部主管战时工业生产,并将重庆定为大后方工业发展的重点基地,从而确立了重庆作为大后方工业中心的城市地位;在政治上,稳定社会秩序,保证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和连续性,重庆由四川省辖乙种市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直接促进了中央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与督导,有利于市区的扩大与市政建设;在意识上,唤起民众觉醒,保持思想导向的主流性与及时性,国民精神动员总会在重庆成立,“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充实抗战国力”,使“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①。

在战时体制下,重庆的战时文化重建将受到战火的严峻考验。举世闻名的“重庆大轰炸”正是日军对重庆进行“航空进攻作战”的罪恶“杰作”,其目的就是“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因而进攻重点就是“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重要的政治、

^① 参见《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载1939年3月12日《新华日报》。

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尤其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于是，日机从 1938 年 12 月 26 日开始轰炸重庆。“重庆大轰炸”的持续时间之久，生命牺牲之惨烈，写下了抗日战争史上空前的一页。然而，重庆并没有在大轰炸之中消失，而是以其崭新的面貌显现出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奇迹，以至于多次架机轰炸重庆的日军飞行员，也不得不哀叹“重庆轰炸无用”，因为“单凭轰炸，使其屈服是不可能的”^①。

在那些抗战时期齐集重庆的作家们眼中，正是重庆大轰炸直接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焕然一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②。更是在大地上出现了这样的“陪都轰炸小景”——“废墟上热腾的从草棚喷出面香，/ 时髦男女的笑声落满污黑座头，/ 生活原没有固定大小，固定尺寸，/ 战争教大家懂得幸福的伸缩性。”^③ 无论是五千年文明所养育而成的民族精神在战时生活中的复兴，还是抗日战争所熏陶出来的乐观态度在战时生活中焕发，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抗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必须吾人人抱定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解放。”^④

所以，一切为着抗战到底，让文学服务于抗战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国作家的最大心愿，而陪都重庆文学运动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文

① [日]前田新里，《重庆大轰炸》，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59、236

② 老舍，《老舍文集》，载《七月》第四集第 1 期。

③ 老舍，《老舍文集》，载《抗战文艺》第 7 卷第 4-5 期合刊。

④ 蒋介石，《蒋中正集》，战到底告国民书，载 1938 年 10 月 30 日《中央日报》。

学运动,尤其是为大后方文学运动的中坚与核心。这是因为“在这一大块辽阔的土地上,有着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姊妹们,说着同样的言语,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同样的民族性”,“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达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① 因此,陪都重庆文学不仅仅是对于陪都重庆文化进行的文学表达,更是以高扬抗战到底的民族意志为己任,因而显示出中国文学运动的抗战文艺方向。所以,不仅大批作家从四面八方来到重庆,而且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纷纷随同国民政府一道迁往重庆,共同推动着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发展。

在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同时,战时首都重庆已经成为民族复兴的全国文化中心,于是,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陪都重庆——“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缩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初,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式,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金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輿情,而彰懋典。”^② 由此可见,陪都重庆的设立,经历了一个从国民政府暂驻的行都,到国都南京之

^① 草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经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载《文艺月刊》第9期。

^②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270号,1940年9月7日。

外的第二陪都,类似从行都洛阳到陪都西安的现实过程,因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既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直接相关,更与重庆成为西南重镇关系密切。

这就无疑证明:陪都重庆的设立,首先在于 20 世纪的重庆,早已经成为长江上游以至中国西南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重庆设立为陪都提供了一次历史契机,从而赋予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以战时性的基本特征。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战时性,一方面展现为抗战时期重庆文化与文学具有的全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又显现为抗战胜利以后重庆文化与文学从全国中心向着区域中心的复归。这就充分表明,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的战时性,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阶段性发展来看,表现为陪都重庆的文化与文学的暂时性存在——仅仅是抗战时期的抗战区,特别是大后方出现的一种区域文化与文学现象——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而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基本构成来看,则呈现出陪都文化与文学的永久性存在——为重庆文化与文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现代基础——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这一难能可贵的文化与文学的宝贵资源。

二

从区域文化与文学的角度来看,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版图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这是因为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就被分割为抗战区与沦陷区。

“沦陷区”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大片国土沦丧日本侵略者之手这一现象,所进行的历史命名。事实上,日军以军事手段占领的中国领土,从 1895 年开始对中国台湾的强占,